

肖东发 王彦祥

海峡两岸图书馆年鉴之比较

摘要 海峡两岸图书馆年鉴在编纂内容上的共同点:都能全面反映事业发展历程,都运用了大量的二次文献,收录了较多的回溯性资料,但均未做到逐年出版。两部年鉴不同点:作者数量较为悬殊,提供信息的侧重点不尽相同,警示性与前瞻性的揭示方面存在差别。此外,在表达方式和检索系统方面都各有特点和不足。

关键词 海峡两岸 图书馆事业 年鉴 比较研究

分类号 G232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nalyze different and common features in the compilation of library yearbook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in China.

KEY WORDS Taiwan Straits. Librarianship. Yearbook. Comparative study.

CLASS NUMBER G232

世纪之交的1999年,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不约而同地出版了最新一版的图书馆年鉴。大陆是1996年以来第2次编辑出版图书馆年鉴,台湾则是第3回编辑刊行图书馆年鉴(以下分别称之为《大陆版》和《台湾版》)。笔者作为大陆版年鉴的主要编撰者,对两部年鉴进行了一番学习和比较,发现它们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小的差异,想法和感触颇多,现罗列出来,以图抛砖引玉。

1 编纂内容之比较

1.1 两部年鉴的共同之处

1.1.1 均未做到逐年出版

《大陆版》创刊于1996年,起步较晚,出版周期较短,而且越来越短。年鉴首卷本收录的是1990~1995年的信息,与内容截止于1989年的《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衔接;1999年卷是它的第2卷,收录的是1996~1998年的信息。

《台湾版》起步较早,但周期较长。年鉴首卷本创编于1981年,1989年出版第2卷,期间相隔8年;1999年的《台湾版》是它在11年之后的第3次出版发行。

《台湾版》三次编印,间隔19年,时间明显偏长,而《大陆版》周期相对较短,更趋近于“年鉴”一年一卷的出版规律。就年鉴而言,时效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之一,出版周期不宜拖得太长,如果《台湾版》能把周期缩至5年甚至更短,就较为理想了。

1.1.2 对事业发展历程全面反映

《台湾版》编纂方针及原则是很明确的:一是提供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之资讯;二是提供图书资讯学教育现状的资讯;三是提供图书馆学术与研究资讯;四是提供图书馆暨相关单位之统计与名录;五是提供学术研究参考与资讯查

检之工具。从《大陆版》上,也同样可以得到以上信息。需要指出的是,第3卷《台湾版》改进幅度较大,与第2卷相比,增加了许多新的栏目和内容,如“图书馆人物”、“图书资讯学系所名录”、“图书馆名录”、“图书馆新建筑图辑”以及“卷后索引”。这些内容十分必要,带有补缺的性质。

从篇幅上看,两部年鉴不相上下,都在130万字以上。反映的信息内容也旗鼓相当;而且两部年鉴与其他专业性年鉴相比,称得上是大型工具书。年鉴承载的信息量多,撰写、编辑工作量也大,内容的严谨与精练就值得商榷。笔者拙见,海峡两岸年鉴都应当在篇幅上再精简一些,周期缩短后,每卷最好控制在100万字以内为宜。

1.1.3 运用了大量的二次文献

譬如“专业文献”在两部年鉴中都占有一定篇幅,特别是对于图书馆学博士、硕士论文,都给予相当的重视。如《大陆版》收录了自1979年恢复图书馆专业研究生教育和1991年博士点建立以来,几所重点大学博士、硕士点的“硕士论文目录”和“博士论文摘要”,这一举措满足了专业读者的迫切要求。因为这部分专业文献很有价值,过去由于难以寻觅,在论文选题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有了这个博士硕士论文目录和文摘,以后的论文选题就不会重复撞车。《台湾版》也在第21章“图书资讯学图书目录”之后,刊载有“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一览表”,起到了相同作用,只不过博士论文没有摘要。

1.1.4 收录较多的回溯性资料

《大陆版》创刊较晚,所编印的第2卷又恰逢世纪之交的1999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20年。所以不论在卷首的专文中,还是在正文的条目里,都组织了一些百年、50年、20年的回眸之作。例如“图书馆管理”、“文献资源建设”、“文献组织”、“目录学”、

“古籍整理”、“读者服务”及“图书馆现代技术”等条目,不止是近3年来的进展介绍,还有近20年来甚至50年的发展综述。

《台湾版》除了反映近11年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外,有些栏目的内容也打破了时间界限。譬如“图书馆人物”,刊载的就是近百年来台湾图书馆界的知名人物。

1.2 两部年鉴的不同之处

1.2.1 作者数量较为悬殊

《大陆版》的编辑出版,是由《中国图书馆年鉴》编辑工作委员会具体运作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年鉴有主编、副主编、编委、顾问、专文作者,还有186位撰稿人及62名特约撰稿人。无论是“专文”作者,还是图书馆学教育专业点的文字介绍的执笔都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各个系统、部门,各高等院校的精英人物和学者名流。港、澳条目的作者则是在当地工作多年的博士。

《台湾版》则是由台湾图书馆一家组织编写并出版的。年鉴内容绝大部分由该图书馆的近30位专家学者执笔撰写,最后由黄渊泉先生编纂而总其成。以一馆人员之力,经历一年多时间,竟完成百万字之煌煌巨著,也算是艰苦卓绝、尽心尽力了。从另一方面考虑,由于作者几乎出自一个图书馆,所述问题也多为作者的个人见地,难免在反映问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产生一些局限性。

1.2.2 提供信息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大陆版》按照专科性年鉴通常的组织方法,将大量信息用特载、专文、事业、工作、研究、教育、学术交流、人物、文献、统计资料、大事记、附录、索引等部类来分类和编排,既有集中概括的综述、专文,也有分门别类细致入微的各种条目,还有高度浓缩富含信息的图表、题录、名录、统计资料、大事记等,可以说调动了年鉴几乎所有的表现形式,将图书馆界各方面内容有机地组织起来,读者无论查检阅读哪一方面的信息,均会有所收获。内容全面而具体。

《台湾版》所揭示的信息,主要是台湾地区公共、学校、专门三大类图书馆的事业现状、史实、文献等情况。全书分为22章,前12章是“概述篇”,包括事业发展与现状调查、图书资讯学教育、自动化与资讯网路、图书馆学术合作、图书资讯学研究;后面的第13~22章为“资料篇”,包括大事记、名录、人物、法规标准、建筑图辑、图书目录及期刊论文索引等。尽管《台湾版》在内容上也涵盖了图书馆的各大方面,但还是倾向于概括地介绍主要情况,使概述分析和资料提供成为组织内容的两大重点。

1.2.3 警示性与前瞻性的揭示方面存在差别

《大陆版》在组织年鉴内容时,既宣传介绍好的经验做法,也不回避工作与研究中的问题,能够从事业发展的大局着眼,客观中肯地展开论述。譬如谈及图书馆学教育时,作者不做泛泛之论,而是结合实际,指出当前“图书馆学教育与事业之间不够协调”,“教育结构层次不合理”,“教师队伍

质量有待提高”等多个问题。而“目录学”条目在对近年来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后表示,今后目录学学科发展并不乐观,困难较多。同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条中,谈到“美中不足之处便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薄弱,以及图书馆学教育的严重欠缺”。此外,《大陆版》打破年度性束缚,增加了一些跨年度及前瞻性的信息资料,如收录了截止于1999年上半年的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最新地址、邮编、电话;编辑了一些图书馆研究机构未来几年的工作计划;还展望了数字图书馆和图书馆法规建设等超前性课题,从而拓展了人们的思路。这样组织材料,深入论述,无疑对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事业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换言之,报喜又报忧、客观中肯地记录与提供信息,才能发挥年鉴的“史记”与“镜鉴”作用。

《台湾版》则记述了10年来台湾地区图书馆发展轨迹,也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数据资料,致使“资料篇”占去年鉴的一半篇幅。这虽然使年鉴的存史目的基本完成,但在内容的深度挖掘上稍显欠缺。它对图书馆的各个问题基本是概述性地描述,以客观事实的组织排列为中心,不触及存在的问题和难题,可谓存史作用有余而镜鉴功能不足。

2 表达方式之比较

2.1 条目体与章节体区别明显

《大陆版》表现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是以条目体贯穿始终。特别是占篇幅最大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等主体栏目,都是以条目形式编写的。其他栏目则以文章、表格、名录、题录、文摘、大事记、章程条例、统计资料等形式进行补充。

《台湾版》在表现形式上,则是沿袭了前两卷年鉴的体例形式,即以章节体的综述文章为主。1至12章的“论述篇”均采用记事文体,直叙笔法,将所述内容组织成一篇篇严谨通畅的专题论文,前有前言,后有结语,中间分节,文末还列上注释。有的章节,如第10章注释多达170多条,这在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年鉴中是不多见的。而后面的“资料篇”又回到典型的年鉴表现形式上来,不仅有名录、图辑、目录、索引、大事记等年鉴的一般表现形式,还有法规标准条文、人物介绍条目,这与前面的章节体形成了鲜明对照。似乎《台湾版》的“论述篇”更像是一部论文集,后面的“资料篇”则俨然是工具书集大成之作。

两部年鉴的表现形式,似乎是大相径庭,而实际上它们都是利用了年鉴允许的表现特征,因地制宜地进行内容组织。《大陆版》以条目体为主,检索阅读均很便捷,适合现代社会信息密集的特点。《台湾版》以章节体为主,将资料集中于文章之后,使问题的展开余地大增,内容论述深入浅出,尤其是图书馆的几大方面,均独立成文,一气呵成,读后使人印象深刻;而“资料篇”作为论述的必要补充,弥补了章节体的不足,使年鉴最终合为一体。

2.2 图表使用相差悬殊

《大陆版》在图表运用上还比较欠缺。数量上,除卷首的12页彩页广告外,正文中再也没有了照片、图片的影子,让人感觉似乎缺少了形象化的信息。表格的运用也比较有限,全书691页,只有20个左右的表格,而且均为普通的黑线表格,未做任何美化修饰。此一弱点,多少影响了《大陆版》的整体形象。

《台湾版》在卷首目录中,有一个“表目次”,清晰地标明该年鉴每一章内运用的表格名称、编号及页码,共计166个表格,若用总页码1130页平均,大约不到7页就安排了一个表格。这个数量与《大陆版》是 $8.3 \diamond 1$,二者差距非常明显。《台湾版》不仅注重表格数量,在质量上也下了一番功夫,譬如,绝大多数表格都用套色法进行美化处理,表格当中不同项目使用不同色调的灰色、粉色、青蓝色予以填充铺色,使版面生动活泼,富于美感。另外,《台湾版》在卷首还列出“图目次”,标明文中采用了近20幅饼图、柱形图、模型图等示意图,再配以不同的颜色,显得十分雅致。至于照片,《台湾版》不是用在广告上,而是单独列出一章,即“图书馆新建筑图辑”,以40个页码、200多幅彩色照片,集中展示了台湾地区图书馆的新面貌。而在“图书馆人物”一章,对所介绍的22位图书馆界名人,均配以黑白肖像照,起到了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2.3 印刷装帧的朴实与典雅

两部年鉴篇幅相仿,可是二者的“厚度”却相差甚远。《大陆版》大约为3厘米,而《台湾版》是5厘米有余,其原因在于年鉴的用纸和装帧不同所致。《大陆版》用纸较为随意,显得简朴了些;采用单色印刷,双栏排版,绝大部分正文使用小五号字,加之行数过多,显得较为紧密。

《台湾版》虽然与《大陆版》字数相近,但页码多出400多页,捧在手里沉甸甸的,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台湾版》版式设计得舒朗、大气,印刷装帧精美,体现出很好的美感。如内文使用70克以上的上等纸张,正文为五号字,行间距较大;《台湾版》不掺杂商业广告,仍采用三色套版印刷,其图表使用广泛,还插入40页彩页。另外,《台湾版》有精装和简装两种版本,印刷装帧均显得精致而认真。

3 检索系统之比较

3.1 书前目录各有特点和不足

《大陆版》的目录是分类体系目录,依照年鉴内容顺序排列,便于读者查检使用。年鉴各部类名称和之下的分目用不同字号黑体字显示,使目录增加了分类检索的层次。

《台湾版》的目录也依年鉴内容特点,组成一个分类体系目录。该目录先划分为“论述篇”和“资料篇”两大部分,之下是各个章节名称,连前言、结语都罗列在其中,充分体现了章节体内容的特质。不同的是,《台湾版》增加了“表目

次”及“图目次”,反映年鉴中表格、图片的运用情况,对每一个图表都按章节标有顺序检索号,同样方便了读者查检,值得称道。此外,“资料篇”的目录只列出章节名称,一些具体细目被移到年鉴正文各章之前,以专题目次的形式来体现,如“图书馆新建筑照片目次”、“图书资讯学图书目录分类纲目”等,这也是《台湾版》的一个独特之处。

两部年鉴的目录均有不足之处。《大陆版》各级类目没有编上顺序代码,索引列在目录最后,但遗忘了标注页码。尽管目录将条目名称(条题)列于各大部类的分目之下,但不完全,具有下位层次的条目有的被掩盖,未能在目录中体现。像“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事业”,目录只反映到省、市、区层次,下面的具体条目并未进入目录。

《台湾版》目录由于受章节体表述方面的限制,显得过于简约。年鉴第4至第8章,在目录中都是“前言、发展现状、结语”3条,读者从目录中很难获知该章节更具体的内容,检索作用不明显。依笔者之见,可以将各节下面的标题列为目录,增加检索点。还有,《台湾版》在正文之中,列出了若干分目录,如第20章“图书馆人物”记载的22位图书馆界名人,书前目录没有体现,而是开辟一个“人物目次”,放在该章节的起始处来反映。类似的情况在“资料篇”的其他章节也普遍存在,其实倒不如在书前目录内同时体现一下,这样更适于读者检索使用。

3.2 卷后索引各有千秋

《大陆版》卷后索引占23个页码,《台湾版》卷后索引占107个页码,从页数上看,似乎两个索引相差许多,但深入索引里面细探,它们各有千秋。首先,为了便利读者使用,两个索引均列有“使用说明”(《台湾版》称做“凡例”);第二,它们都采用复式索引结构;第三,均使用综合性主题词(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称、篇章名称、标题词等)来标引和编排索引款目;第四,都利用参见、互见等参照法,提供更多的检索点;第五,索引出处均用分栏标记的方法,以缩小检索区域,提高检索的查准率。

两个索引的特点与区别有如下几点:其一,使用的排检法不同,《大陆版》使用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台湾版》则用汉字笔画顺序排列,因中文笔画检字顺序不只一种,因此在索引正文之前,特地增列了一个“索引检字表”,以指导读者查检;索引中同一笔画的不同汉字更替时,使用粉色字体以予区别与提示。其二,索引款目表示法不尽相同,如遇到连续记述一个主题内容时,《大陆版》只标注起始页码,《台湾版》则在起始页码后,添加一个小号“—”,以示接续;《大陆版》处理索引后缀时用“小括号“()”,而《台湾版》采用冒号“:”。其三,排版的缩格含义不同,《大陆版》在上级标目下缩二格,表示下一级标目,并起附见作用;《台湾版》兼采相关索引方式编排,于每一标目下尽可能地标注出所载页码的内容提示词,主要用来体现附见作用,而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比较淡薄。其四,提供多重检索的轮排方式与多寡不同:

《大陆版》只是采取一般的标引方法,然后将标引词按汉语拼音音序轮排,故此轮排数量较少;《台湾版》采用多重轮排方式组织标引词,并不限制它们的多寡,所以在主题范畴广的标引词下,往往汇聚了较多的附见性标引词,在增加检索点的同时,也膨胀了索引篇幅。其四,所采用的字号及行距不同,使两个索引篇幅相差悬殊,将近5倍。尽管两个索引提供的检索点有多寡之分,但最终查检出来的年鉴信息,应该说是大致相等的。这既反映了两个索引编制上的差别,也体现出二者异曲同工的效果。

4 感想与建议

海峡两岸由于40余年的隔绝,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有些差异,但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献,又肩负着共同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使命,共同面临着图书馆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我们一起研究,携手解决。两岸图书馆年鉴的编撰单位,应该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只有相互交换编撰图书馆年鉴的心得体会,才能把

两岸的年鉴编纂好,出版好。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在现有的两部年鉴基础上,共同编纂《中华图书馆年鉴》,其内容应涵盖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图书馆事业的各个方面,由两岸四地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联合出版。同时,为推动两岸图书馆年鉴的协同发展,我们建议适时成立“海峡两岸图书馆年鉴工作与研究协调组织”,并创造条件,尽早召开“海峡两岸图书馆年鉴编纂工作研讨会”,进行两岸图书馆年鉴及专业工具书编纂方面的学术交流,以促进信息互通、内容互补、经验共享、优势借鉴,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肖东发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年鉴》编辑研究委员会主任。通讯地址:北京中关村。邮政编码 100871。

王彦祥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教授,《中国图书馆年鉴》编委。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邮编 100037。

(来稿时间:2000-12-18)

(上接第36页)(2)Q太低。Q太低可能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产量低,即在现有的市场价格 P_0 下和生产能力的条件下,ISP若生产 Q_1 则是有利可图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或是开工不足等原因,导致它只生产 Q_0 的产品,从而使得收入 P_0Q_0 小于成本 AC_0 、 Q_0 ,导致亏损;二是销量低,库存积压,这主要是由于产品与市场需求不相符,或生产规模控制不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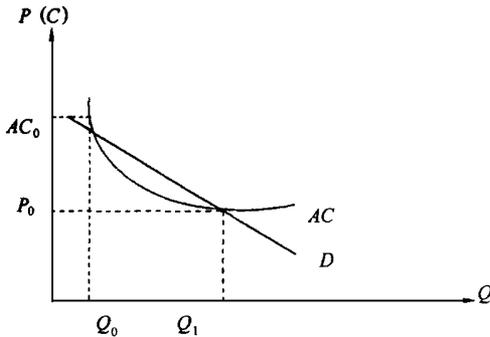


图4

(3)C太高。如图5所示,在现有的市场价格和产量的条件下,对于 AC_1 来说,ISP是亏损的,而对于 AC_2 来说,ISP是赢利的,因此,造成目前ISP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ISP的平均成本线太高,没有实现规模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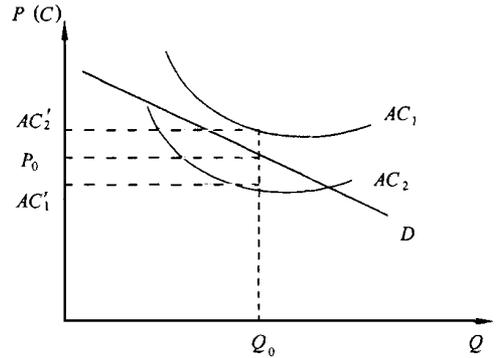


图5

参考文献

- 1 高翔. 用户怎样选择 ISP. 情报杂志, 1998, 17(3)
- 2 葛敬民. 我国因特网的发展需要宏观调控. 图书情报工作, 1998(6)
- 3 马莉. Internet 在中美的发展比较. 图书情报工作, 1999(9)

注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79870094)的研究论文之一。

邱均平 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 武汉大学。邮编 430072

段宇锋 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管理学院研究生。

颜金莲 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稿时间:2000-11-23)